

20世纪初陕西三大教案

王 静

(西北大学 西北史研究室,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叙述了20世纪初发生于陕西的三个典型教案,即:燕子砭教案(1900年)、三边教案(1900年)、平利洛河教案(1903年),阐明了这些教案的发生根源于基督教传教事业的殖民性与中国民众民族自卫意识之间的尖锐矛盾。20世纪初陕西三大教案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民族自卫意识,打击了殖民压迫势力,是近代陕西人民民主、民族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关键词:20世纪初;燕子砭教案;三边教案;平利洛河教案

中图分类号:K25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0)01-0122-04

鸦片战争后,以坚船利炮为支柱的基督教传教事业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由沿海通商口岸逐渐渗入内陆都市、乡村。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国民众的矛盾冲突也因宣教事业的殖民色彩与东西文化背景的不同而愈演愈烈。近代中国社会频频发生的教案即是这一矛盾与冲突的具体表现。本文拟对20世纪初发生于陕西的三个典型教案(燕子砭教案、三边教案、平利洛河教案)进行叙述、分析,以期透视出这些教案发生的原因及所产生的历史作用。

燕子砭当时地属汉中府的宁羌州(宁羌州系明代所建卫、州的名称,1913年改设宁强县,1942年易名宁强县)。天主教传入宁羌,始于清光绪年间,先后有数名外籍神父至燕子砭传教,开辟了燕子砭、老乌咀、寄刀沟、大安驿、青木川等传教会口,其中燕子砭教堂位于嘉陵江与燕子河交汇处的青岗坪,隔燕子河与燕子砭街相望。主持燕子砭教堂的神甫为法国传教士郭西德(P. crescitualgefico)[1]。《宁羌州乡土志》对燕子砭教案发生之缘由有明确的记载:“光绪二十六年,州西大饥,法国天主教士郭西德以赈济为名,诱民入教,泊来者日众,供亿不支,乃纷纷苛派良民,主客交讧,遂起焚杀之祸事。”[2]知燕子砭教案的发生缘由于传教士与中国民众间经济利益的冲突。推动燕子砭教案发生的则是义和团运动,据《宁强教案调查》一文所述,燕子砭教案的主要领导人为李云栋,其兄李朝栋当时在汉中府教书。李云栋在得到义和团运动的消息后,即写信给李朝栋,了解义和团运动的情况,同时联络当地的潘长富、潘长贵等人,发动数百名群众,于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1900年7月20日)持刀、矛和各式农具向位于青岗坪的燕子砭教堂发起进攻。郭西德欲出逃,但被民众围困住,次日被杀。

收稿日期:1998-09-21

作者简介:王静(1973-),女,江苏南京人,西北大学西北史研究室博士研究生。

同时被杀的还有杨兴隆、李大银、周雅各伯等中国籍教民^[3]。此文所述表明,燕子砭教案发生于义和团运动这一历史背景之中。事发后,宁羌州知州刘鼎臣至燕子砭劝谕民众,以免事态的进一步扩展,众人相继散去。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由“抚”改为“剿”,燕子砭教案在这一背景下,被清政府以严厉镇压的方式予以了结。

首先,处决了事件的主要领导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一月,农民潘长富、潘长贵及武举人杨海等先后被捕。清政府仍以要犯未获而继续追捕,李云栋为安乡里,出而自首,与之前被捕的潘长富等人,于同年七月被汉中知府杨崇伊下令杀害于褒城,并在燕子砭悬首示众。1971年2月,陕西省博物馆碑石调查组在宁强发现李云栋墓碑,上记载了他为安乡民,大义自首及就义的经过,碑为李云栋家乡人为歌颂其功绩而立^[4]。其次,清政府与天主教堂达成处理燕子砭教案的妥协协议。据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四日宫中朱批奏折《陕西巡抚升允奏议结宁羌州教案请奖教士及出力官员折》所记,协议内容主要包括:赔偿白银五万两,作为郭西德及被害教民的命价;允许在宁羌城及燕子砭、汉中各地修建教堂;由汉中知府具名立碑记教案经过,在燕子砭及汉中为郭西德立纪念碑;在宁羌城内修建教士“公馆”一所^[5]。燕子砭教案虽被清政府镇压,当地民众却并未因此而熄灭反教意识。燕子砭一代始终流传着“五龙六虎四条牛,两个秀才赛诸侯”(五龙,指李朝栋、云清、云栋、云悦、泽栋兄弟5人;六虎,指杨浚、海、龙、耀、茂、春兄弟6人;四牛,指潘长青、长富、长荣、长贵兄弟4人;两个秀才指在褒城死难的李云栋和杨春华)^[3]的说法,即表明了当地民众对教案发起者和领导者的赞誉与怀念。

二

三边,指位于陕北的靖边、定边及定边所属的安边堡一带,北与内蒙乌审旗、鄂托克旗相邻。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始,已有比利时传教士叶茂枝至靖边县属的宁条梁镇传教,建立了南沙口教堂。光绪八年(1882年),又有法国传教士在靖边县所属的宁条梁蒙人居住地红柳滩小桥畔一带建堂劝教,并修筑围墙。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小桥畔教堂已管辖6所教堂。传教士在这一带通过各种手段收购土地,并用土地、籽种、牛犊作诱饵,吸引周围群众入教,势力不断扩张。传教士在占用大量土地后,又对当地民户进行地租剥削,二者在经济利益上有着根本性的冲突。同时传教士又干预地方行政,包揽词讼,偏袒教民。长期以来,在民众中已普遍存在着反教的心理。这一心理因义和团运动的推动,而引发出一场规模较大的反洋教斗争。《秦中官报·秦事汇编》甲辰三月条记:“庚子夏间,津沽变起,陕边蒙部亦因与教堂不和”而起争端,即指明了义和团运动对三边教案的直接推动作用。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在靖边开始活动。同年七月十五日夜,义和团团民、红灯照姑娘及乌审、鄂托克旗蒙兵共数百人,先捣毁了南沙口教堂,继而围攻小桥畔教堂。此次围攻长达48天之久,因教室内藏有枪支弹药,力量对比悬殊,教堂未能攻克。整个战斗过程,三边群众伤亡达百余人,击毙外籍教士1人,教民10人。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慈禧太后对义和团运动由“抚”到“剿”,三边地区围攻小桥畔教堂的群众在清兵到来之前已相继散去。事后,三边天主教堂以打死传教士一名为由,与清政府交涉,清政府签订了妥协性的合约。据陕西省档案馆所存《三边教案和约》所载,中方赔款“银十四万两。又有乌审旗下历年与洋堂土民等争闹,拔须、扯衣、烧房三案,共议赔银三千五百两”,并认定各项赔款“以牛马地土典卖作价抵赏者,均系蒙洋两面各出情愿”,这就为以后教堂以赔偿为由,进一步索购土地埋下了

伏笔。据《三边教案纪略》，赔款共银 14.35 万两，其中乌审旗分担 4.55 万两，鄂托克旗、札萨克两旗分担 9.8 万两。后乌审旗因无款可筹，将大淖碱池作为抵押。鄂托克、札萨克两旗付出 3.4 万两后，欠 6.4 万两无力支付，被迫将边墙外原划归汉民耕种的土地，作为赔款抵押，面积约 25920 平方里[3]。

三边和约签订后，民众的反教活动仍在继续，《秦中官报·秦事汇编》甲辰三月条记载，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定边客民任天绪与靖边县民耿作、张彪等谋划起事，有王木匠、郭木匠、高士英等联合，造印信文件、旗帜号衣，“分送蒙人，约期会兵举事”，后因蒙民札拉呼奇给教堂报告，事未举而泄密，任天绪、耿作、高士英三人被“就地正法，传首示众”。虽如此，三边一带仍有反教势力的存在，反映出民间反教心理的普遍性与持久性。

三

平利县位于安康地区东南部，扼川、陕、鄂之孔道，是江湖会会众经常出入的地方。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五月，此地爆发了以哥老会会众为首的反洋教事件，提出“兴汉灭洋”的口号，为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陕西又一起规模较大的教案。据《平利洛河教案纪实》所载，平利洛河教案的发生，由最初的民教矛盾而引发。当时洛河地带团保袁瑞林、刘子模，因浮派烟地钱，引起民愤，而被当地民绅詹朝珠等控官责革，两人即投奔天主教堂。1903 年 5 月，袁瑞林为报复詹朝珠，向教堂诬告詹等人勾结四川哥老会人何彩凤在洛河一带毁谤教会。安康教堂教士当即写信给平利县知县王宗濂，要求查办此事。王宗濂遣县役梁升查办，梁将何彩凤锁押。哥老会首领王乱刀子听说后，立即集合众人，将何从梁升手中夺回，并至袁瑞林家，将其房屋焚毁，击毙袁瑞林父子及其余教民 4 人，同时将安康教堂派往洛河调查事件的教民叶大伏和 1 名清兵高奉图砍毙。事发后，陕西巡抚升允急令平利县令缉拿王乱刀子等人。安康、平利县役很快即将王乱刀子等 6 人缉拿。何彩凤于是集合众人，驻于洛河旁的太白庙，竖起“兴汉灭洋”的旗帜，前来加入者达千余人[3]。最初的民教冲突发展成为一场规模较大的反清反洋教起义。据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十一日宫中朱批奏折《陕甘总督崧蕃等奏平利县民仇教抗官现已平定折》所载，陕西巡抚升允在得到起义的消息后，一面命令将境内教堂、教民加以保护，一面“飞飭驻扎石泉续备防军副中旗统领副将周玉堂，就近督率该旗弁勇星驰前往，相机剿抚。”又令驻扎汉中左旗“移军分扎兴、汉交界各要隘”，再派“试用道郭人漳、补用副将刘琦督率新军马步两旗驰赴剿办”。清军与义军在砖坪厅属的黑虎寨、鸡公峡庙等地展开战斗，因武器之钝、组织之散，起义人员伤亡惨重，何彩凤率余众撤退。起义失败后，郭人漳率军抵安康城，与教堂会商了结案情。议定结果，此案义军杀死教民 7 人，给安康天主教会赔银 8000 两，在平利县洛河镇为教会修建教堂一座。议结后，郭人漳至平利，将所俘的起义人员，同地方官一起，“提案逐一研讯”[5]。又经陕西巡抚升允批准，当即处决 30 人，当堂刑毙谢显纲、罗金两名起义骨干，另加砖坪厅通判在刑讯被捕义军时所杖毙的周兴、袁发等 6 人和战斗中牺牲的 7 名义军战士，共有 40 余人被害[6]。

四

20 世纪初发生于陕西的三大教案，是殖民时代基督教教会在中国行其特权统治和中国民众反抗特权统治，二者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矛盾冲突的产物。政治上，有不平等条约的维护，传教士多干涉地方行政，参与诉讼，包庇教民。教民受到传教士的庇护，往往为虎作

张,从而引起普通民众与教民之间的矛盾与仇视,进而发展为反洋教运动。1870年9月20日,丁日昌奏《教务隐忧疏》,对此问题已有揭示,“传教士所到之处,不择良莠,广收徒众,以多为能,无识愚民或因词讼无理,或因钱债被逼,辄即逃入教中。教士听其一面之词,为之出头庇护,词讼无理者可以变为有理,钱债应还者可以不还。莠民以教士为逋逃藪,教士以莠民为羽翼。俗谚曰:‘未入教,尚如鼠,即入教,便如虎’,呜呼,此百姓之积恨,所以日深,教士之声名,所以日坏也”[7]。20世纪初陕西三大教案的发生,教民与非教民间的冲突,即是主要原因之一。经济上,教会往往侵吞民众的产业。以田产而言,据《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28所载,在义和团运动前夕,三边地区的靖边一县,“寄居洋人自小桥畔起至城川口止,共租种蒙地四千七百三十五晌半,……又另开城川口蒙地五百晌”,而定边县北至城川口席箕滩接近地,均为膏腴之田,亦“为洋人买去多半”。三边地区天主教堂大量占有土地,致使当地地方官员忧心忡忡,“设不严重交涉,数十年之后,汉蒙耕牧之地,恐尽归入外人势力范围”[8]。经济利益的冲突及中国民众所受教会的经济压迫,是仇教与反教的一个内在原因。最后,表现在文化的对立上。一方面,乡村民众站在传统文化的角度对外来文化予以激烈地斥责。他们对教会不敬祖、不事祖先的行为极为不齿,认为“鬼子其形,于(与)中(国)大有不同,羊眼猴面,淫心兽行,非人也。行事不敬神,不敬先人,不学孔孟,不知礼仪(义),丙(并)无人伦。”[9]另一方面,殖民时代,传教士所奉行的“上帝的荣光一定要在中国显现,龙要被废止,在这个辽阔的国度里,基督将成为惟一的王和崇拜的对象”[10]这一强硬的传教政策,更加导致了二者间矛盾的不可调和。20世纪初陕西三大教案的发生,当然也不脱离于这一文化背景之外。

近代中国社会,外强侵凌,以救亡图存为宗旨的各种社会自救力量纷纷而起。广大乡村民众以一种自发的、朴素的反洋教思想来表达对外来压迫的不满与抗争。在他们眼里,洋教即是外来压迫的一个代表,反洋教即是反外来压迫和反殖民侵略。尽管他们的斗争有着种种的缺陷,但在山河破碎的时代,对唤醒民族自卫意识及打击殖民压迫势力,均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20世纪初陕西三大教案的发生是近代陕西人民民主、民族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民族意识的觉醒及反击殖民压迫势力,均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 考 文 献]

- [1] 宁强县志编纂委员会. 宁强县志[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 [2] 陈芑芬. 宁羌州乡土志[M]. 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0.
- [3] 陕西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陕西文史资料(16)[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4.
- [4] 陕西碑石调查组. 一批反映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碑石[J]. 文物, 1972, (7).
-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 [6] 董志勇. 平利教案与平利教案碑[J]. 文博. 1985. (5).
- [7] 王明伦. 反洋教书文揭帖选[M]. 山东:齐鲁书社. 1984.
- [8] 宋伯鲁. 吴廷锡纂. 续修陕西省通志稿[M]. 西安:陕西省通志馆. 1935.
- [9] 程 啸. 张 鸣. 晚清乡村社会的洋教观——对教案的一种文化心理解释[J]. 历史研究. 1995. (5).
- [10] 李时岳. 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责任编辑 黄维民]